

战火中的大学

——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成仿吾 著



人民出版社

战火中的大学

——从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张其成 著



战火中的大学

——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成仿吾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关 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 成仿吾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01-012874-0

I. ①战… II. ①成… III. ①中国人民大学—校史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064 号

战火中的大学

ZHANHUO ZHONG DE DAXUE

——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成仿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120 千字

ISBN 978-7-01-012874-0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言——教育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祖先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

根据文献资料，我们古代在夏、商、周三代时，就有了“校”、“序”、“庠”的记载，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学校吧！不过，这种“校”、“序”、“庠”究竟是怎样的学校组织，各书记载的并不详细，也不统一。有的把它们说成是不同朝代的不同称呼：“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也有的把它们当作同一朝代（周代）的各级组织：“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曾对这种古代学校组织十分赞扬，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

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面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郑观应：《学校》，《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02—903页）郑观应把古代学校说得这么好，目的在于提倡西学，按照西方那样办洋学堂。至于中国古代学校，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好（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还是值得研究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遥远的古代就是很重视教育的，那时就有了“校”、“序”、“庠”这样的学校组织。外国学校的出现恐怕没有中国这样早。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看来，“校”、“序”、“庠”还都是一些公办学校，学生也不会多，只能是一些氏族长、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之类的少数人，主要是模仿，重在实践。私立学校要从春秋时代的孔夫子说起。孔夫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的学校里有自己讲学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送一束干肉，就可以认他作弟子，他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生有颜渊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但是，孔夫子的教育主要也是为一定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也注重实践，他教育人们不要犯上作乱；他修《春秋》的目

的就是在于正名分、寓褒贬、使乱臣贼子惧；他的弟子有很多人做了大官，取得很高的地位。

秦汉以后，选拔人才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汉至隋为一段，自唐至明又是一段。前一阶段是以选举（即推荐）为主，间用考试；后一阶段则是以考试为主，参用科举。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选举或考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是从现有的人才中甄拔，而不是从未成的人才加以教育。就是说，忽视了学校教育。唐宋以来，各地设立书院之风，虽甚盛行，但它也主要是为当时的科举制度服务的，侧重语言文学的。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资本主义也在客观上发生和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病愈来愈暴露得明显，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倡导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而办学堂，并引中国三代就有学校设置以为证。而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感到再拘泥科举制度，偏重语言文学，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统治的需要，也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清政府才不得不于一九〇五年八月正式下令停开科举，广办学校。

但，教育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就在清政府下令停开科举、广办学校的同时，仍然强调了“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 66

页)。因此，学校虽然开办了，但仍多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拿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来说吧，当时的学生仍是出身于举人、进士的京官。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虽然改为北京大学，但仍然沿袭着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学生仍然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对教员的评价，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因为老师有地位，学生毕业后才有靠山。

蔡元培是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值得纪念的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作了若干改革。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对这个学校作了重大改革。他遵循“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因而使北大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在客观上就为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获得了一个活动的园地，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个可以传播的场所。我国许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同志，都曾在当时的北大工作或学习。

那时的北大仍然是一所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在那里，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还有胡适派的影

响。后者的影响恐怕比前者还要大些。因此，从北大出来的不仅有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更多的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的得意弟子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等人，后来大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至于其他的外国人直接办理的教会学校，学费昂贵、招生很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还是爱国的，但确有少数人数典忘祖成了洋奴买办。毛泽东同志曾说：“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友谊’，还是侵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买办”和“奴才”；事实上，与帝国主义者愿望相反，我们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有的也是在这些学校中学习过的；多数毕业生和留学生还是有爱国心的，现在成了为新中国服务的各门学科的老专家；毛泽东同志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就帝国主义的办学目的和愿望来说的。就是说，它的教育是为它的侵略中国的政治服务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十月革命后不久，列

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站在政治之外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我们公开声明，说学校可以在生活外，可以在政治外，这是撒谎和伪善。”

列宁的这段批判，对旧中国也是适用的。毛泽东同志上面的那一段话，也就是这个意思。

旧中国确实有广大的失学失业的爱国青年，他们希望从学校中求得真知灼见，具备真才实学，以便为祖国贡献力量。但是，旧中国的那一套教育制度，理论脱离实际，所学非所用，使他们大都不能如愿以偿，毕业即失业，仍然找不到出路。记得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批评旧大学所学非所用的时候，曾生动地举了鲁迅先生，也举了我的例子，因为鲁迅在日本是学医科的，我在日本是学工科的，结果却都成了用非所学。

总之，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是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十分强调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生活。重视教育必须为革命的政治斗

争服务，而要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特别是在苏区和解放区中）服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发现人才，培养干部，使千百万的优秀人才从火热的实际斗争中成长、壮大。

为革命事业服务，从革命实践中培养干部，这决不是说可以取消学校教育。政治和教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应该包含的不同内容。一些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一些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理论和专门技能，是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专门进行传授的。实用主义者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即取消学校教育的观点，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不取法的。

因此，我们党建立后，虽然面临着十分紧迫而复杂的革命斗争，但不论是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十分重视学校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提高文化。

至于学校教育的形式，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条件，随时都有所变化和发展。例如，一九二一年十月就在上海开办有平民女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间，又开办了上海大学（共分社会学、中文、外文三系，以社会学系最大，由瞿秋白同志任主任）。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我们党又参加办黄埔军校，派周恩来同志去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邓中夏、刘少奇同志在广州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劳动学院，邓任院长，刘任教授；至于毛泽东同志等在广州、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苏兆征同志等在武汉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和红军领导人民创造了广大的红色区域，因而也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教育体系。

当时，红色区域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 页）

红色区域文教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同上）

根据这个总方针和中心任务，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采取了革命措施，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创造了各种崭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奠定了革命政权下的新教育制度。所有这一切，才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大革命。

一九三三年，党在瑞金成立了共产主义大学，培养

党的工作干部。同年还成立了苏维埃大学，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劳动、教育、司法等班。还设立了工农红军大学，以培养军事干部。设立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以培养教育工作干部和学校师资。此外，还设有各种技术学校和军事特科学学校，如无线电、卫生等技术学校，工农红军步兵特科学学校等。虽然由于战争环境，学校的设备简陋，学习期限短促，但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来办学，却培养出为党为人民所需要的大量的优秀革命干部。

除上述学校教育外，根据地内还普遍实行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社会教育的形式是在农村中普遍设立夜校，儿童教育的形式则是在农村中普遍设立列宁小学。一九三〇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 13%；而红色区域内，如兴国县的入学儿童，却占学龄儿童的 60%以上。

说到红色区域的革命教育，我们非常怀念无产阶级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徐老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应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书特书的。徐老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和瞿秋白同志一道被任命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秋白同志为部长，徐老为副部长。但秋白同志从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

初还未进入中央苏区，所以红色区域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老负责。

徐老不仅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而且亲自创办师资训练班，不久，就发展成为中央列宁师范学校。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什么都做。徐老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着，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他在瓦窑堡仍旧办列宁师范学校，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他一人兼任。有一次，我到师范学校去找这位徐校长，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找到伙房，才找到了他，原来这位老校长正在帮厨给学生烧饭呢！他这种精神，真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师表。

一九三一年，我从德国回来，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担任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长和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那时，负责审查各县的识字课本，也自己动手编写识字课本。去年湖北省还给我送来一本当时英山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翻印的列宁小学校使用的《识字班课本》第二册。这本书是在第一册认识三百字的基础上编的，共二十九课，都是密切联系实际。例如：

第十二课讲土地革命，课文中写道：

风把稻吹成黄的波浪，
热血儿在我心头震荡，
一片前进的呼声把豪绅地主吓得神魂飘荡。

同志们！

快举起镰刀、斧头、大红旗，
求我们自己的解放！

第十九课是讲党的领导，课文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
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
我们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坚决奋斗，才能彻底解放。

课文紧密结合革命政治，同时也很重视文字练习，例如第二十三课的课文便这样写道：“我们不但读书，我们还要练习写字。字写的好，才能写信，做简短文字，生活上才添许多便利。”

课文还注意了结合儿童生活的特点，例如，第二十七课便是这样一段课文：“我在路边放牛，路上走来一个叫花子。我怕他是白匪的侦探，向他要通行证。他没有通行证，我把他送到乡苏维埃去了。”

这个识字班的课本是当时由我编审的，时光流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今天读来，倍感亲切。从这个课本看

来，可以知道，我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是为它们服务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全民族培养出大量的政治、军事、文教、财经、群众运动等各方面的干部，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当时国民党区域的高等学校，已纷纷停办。有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但也被弄得破烂不堪，教师不能安心教学，学生也不能安心学习。有的学校则关门大吉。例如原设在青岛的很著名的山东大学，在日本强盗还未打到山东的时候，就搬了家，六、七百人带着图书、仪器，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一路走一边减员，图书、仪器也一边丢散，结果到四川后，人和东西几乎丢散殆尽，办不成学校了。山东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高等教育状况，怎么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呢？国民党也有干部教育，办有各种训练班，但是除了一部分实际上由我党人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掌握的训练班以外，大部分国民党办的训练班，在抗战初期只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服务，而在武汉失守以后，便逐步成了灌输法西斯教育的训练班。这是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

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狠抓

干部教育，以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因此，在陕甘宁边区，除设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外，又设有陕北公学等培养干部的学校。此后，各根据地也仿效这种榜样，纷纷设立各种干部学校（如建立各地的抗大分校，晋察冀成立有华北联合大学等）。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种干部教育。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说：“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又说：“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

全国解放，即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后，具备了办好教育的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形势也迫切需要提高教育的水平。特别是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果不能提高教育的水平，我们的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例如，为了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一切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又都必须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懂得新时期的政治学、法律学，……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没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一